

學人往事

歷史轉折點：「四二六社論」 和「四二七」大遊行

● 王超華

一 從特定事件看歷史轉折

每當提及1989年北京的學運和民運時，首先浮現在我眼前的都是「四二七」大遊行。在人群振奮的西二環路，路邊腳手架上一排排工人熱情致意；在人山人海的長安街，兩邊樹叢上居然站了那麼多人；還有西單路口廣告牌上震耳欲聾的敲打和吶喊，東單附近隔着糾察隊扔給我們的汽水、冰糕、麪包……那真是理直氣壯的主人翁氣象，想起來就會心跳加快，眼眶濕潤。其實，我是那天中午過後，才在西長安街加入學生隊伍的。幾個小時之前，我還在以學生聯絡員的名義，到處傳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時任主席周勇軍取消預定遊行的通知。耐人尋味的是，傳達取消通知時，我盡心盡力，並沒有提出任何疑問；而加入遊行隊伍後，我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興奮而積極，竭力主張帶頭的中國人民大學隊伍衝擊西單路口東側的軍警，一點也沒覺得自己上下午的表現之間存在任何衝突。看似矛盾的轉變自有其原因：一方面，胡耀邦追悼會之後，學生留給社會的整體印象是有組織有秩序。我雖然已經參加了兩次高自聯代表會，但自己心目中的這個基本印象並沒有改變，總覺得主席和常委會一定比我們知道得更多，有更全面的規劃，取消遊行一定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任何已經多少加入到悼胡學潮中的學生，那天都準備好了要表達自己絕不接受「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人民日報》，1989年4月26日，第1版）的決心，我本人也不例外。一旦看到數不清的旗幟隨着學生隊伍遠遠走過來，又看到夾道助威的民眾，立刻就能體會到遊行召喚出來的那種共同心聲和意志，就會義無反顧地加入進去。經歷過「四二七」大遊行，一切都不一樣了，我成了堅定的學運積極份子，至今仍不後悔。

這僅僅是當時我個人的獨特經驗嗎？我覺得並不盡然。知識界從一開始就給予「四二七」大遊行極高評價，並積極參與後續行動。5月10日晚，包遵信和戴晴受人民大學青年教師邀請演講，同時聲稱「四二七」大遊行標誌着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程進入重要階段。他們兩人之後的進路不同，但可以說都受到「四二七」

的激勵鼓舞——戴晴主要寄望於在體制內拓寬言路，包遵信則在絕食發起前夜的5月12日晚，和蘇曉康等四十多位中青年知識份子一起，計劃舉行「五一五」知識界大遊行，並為此起草題為〈五一六聲明〉的文告。事實上，很多人都是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後，更積極地投入到運動中。新聞界就是在一周後的5月4日那天走上街頭，打出「新聞要說實話」、「不要逼我們造謠」等標語，舉行了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新聞從業者的示威遊行，並在5月9日向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遞交了要求對話的請願書。那些發起絕食的學生，也接受了「四二七」這個標誌，一直到戒嚴令發布一周後的5月27日，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發表「十點聲明」，其中還包括將4月27日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

為甚麼？最直截的回答可能是：因為那是第一次。「四二七」大遊行從最初計劃到臨時取消再到各校學生不顧阻攔分別走出校園，參加者始終沒有想過要預估人數；關注的是「走出去」，表達反抗的意願。由於沿路有上百萬市民夾道支持，那一天出現傾城出動的轟動效應，但堅持在遊行隊伍中步行十幾個小時的，是那十幾萬學生，絕對數字並不特別驚人。與此相較，絕食開始後的5月17日，從事先動員就以「百萬人大遊行」為號召，事後適逢新聞管控短暫鬆綁，《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消息，並同時發表題為〈歷史，將記住這一天〉的長篇通訊（〈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人民日報》，1989年5月18日，第1版；〈歷史，將記住這一天〉，《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年5月18日，第4版），官方和媒體估計的遊行人數在120萬到200萬之間，宣傳動員和參與人數都遠遠高於「四二七」，但其中的決絕和震撼力，卻略遜於「四二七」，而且顯然帶有受到「四二七」成功先例的影響。

因此，「第一次」回答的只是表象。回顧前因後果，可以清楚看到，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官方殺氣騰騰的「四二六社論」——在官方刺激下，民眾格外主動積極地回應學生上街的行動，從而實現了大規模社會動員。官方的「四二六社論」和學生民眾的「四二七」大遊行，標誌着以反思文化大革命為特徵的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遭遇到根本衝突，也注定了「八九」/「六四」是中國當代政治的重要轉折點。對此，我在一本文集的〈引言〉裏曾有所討論：

六四鎮壓在中國政治生態中造成的重大轉折……和此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有關。首先，從中共統治集團的角度看，改革的初始動機來自否定文革，毛澤東時代以拒絕回到1949年以前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動員話語轉變為〔改革開放時期的〕拒絕回到「十年動亂」。文革作為恐嚇式參照系一直持續到胡耀邦逝世後的「4.26社論」，黨內高層則直到有中學生聲援天安門絕食時，還將其比附為紅衛兵造反式的「娃娃上街」。六四之後，終於可以擱置文革這個參照系，也不再爭論姓「社」姓「資」。「穩定壓倒一切」和「發展是硬道理」成為新指南。需要動員社會恐懼「動亂」的心理時，可以直接指涉國際上正導致冷戰結束的「蘇東波」和各種「顏色革命」，以及後來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2008年的京奧成功和金融海嘯，奠定中國大國崛起新姿態，

維穩和發展主義的結合終於完善為「主權在黨」言說。換言之，今天中共一黨「定於一尊」的地位是靠六四坦克機槍殺戮平民打開的出路。

其次，文革作為參照系，對於1989年參加抗議示威的學生和市民來說，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涵義。早在胡耀邦被迫下台的1987年1月，社會上已經逐漸形成公眾反響與官媒分離的輿論場，思想言論和文藝作品常常會有越挨官方批判越受公眾歡迎的景況。公眾勇於表達自己的不滿，在「4.26社論」出爐後傾城而出，參加聲勢浩大的「4.27大遊行」，以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表達自己堅決反對回歸到文革後期「四人幫」式自上而下操弄輿論的「運動群眾」。這樣的公共場域，在六四鎮壓後受到威嚇，但並未全然消失。在當局焦頭爛額多方拯救經濟的1990年代和新世紀的最初幾年，各個領域仍有勇敢的知識人做出不凡表現。但在中共當局方面，一旦經濟壓力減輕，首要對付的就是公共空間和公共議題。沿着這個邏輯思路，到了習近平當政第二任期，公共空間已被擠壓至幾近於無。人們也許可以對很多事情發言，但是常常被限定為「私人」意見，很難以「公共事務」的名義提出自己的意見而不被指為「煽動顛覆」。只有中共一家有權代表「公共」，所謂的「大道為公」，成為中共「霸道為公」。例如，公款辦學的大專院校，被視為是中共在出錢養活教職工，並藉口意識形態「錯誤」而隨意以停職開除等措施懲治就公共事務發言的教職員工。這類作為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變本加厲。（王超華：〈引言〉，載《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周年祭》〔台北：渠成文化，2019〕，頁14-15。）

不過，以上論述仍有不足，沒有充分注意到鄧小平主政作風和文革時期「四人幫」的不同，以及社會反彈的不同歷史條件。值得注意而上述引文沒有討論到的，是1989年「四二七」大遊行與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的遙相呼應。

二 「四二六社論」：鄧小平終結其與民間同行之路

從鄧小平與「四五運動」的淵源來說，最主要當然在於他1975年主政時的政策深得人心卻招致「四人幫」忌恨，造成他的名字和形象成為清明節廣場上的爭奪焦點，在4月5日清場後連續兩個月都是《人民日報》點名批判的靶子。「四五事件」不平反，鄧就不可能充分執掌權力，二者聯在一起無法分割。兩年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同時為二者翻案，遂被當作改革開放的起始點，至今仍在紀念。但是，鄧本人究竟是否看重民眾當年以其名義掀起的反抗，又或者在甚麼意義、何種程度上看重，卻是頗可質疑的問題。可以確定的是，鄧其實深惡痛絕「四人幫」在社會管理上強迫大眾「理論學習」搞運動，因此，在他主導下出爐的「四二六社論」，並沒有多大興趣像「四人幫」那樣去「運動群眾」。但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他其實又深為警惕民間社會政治參與的活躍自由，視其為實施高效統治的障礙，所以一直在「進一步、退兩步」地試驗，如何才能既放寬經濟和社會管控，又不放棄中共一黨專制。正如魏京生寫於1979年3月並（實際上）因之入獄的〈要民主還是

要新的獨裁》一文所說，鄧小平一旦獲取權力，在追求所謂「社會正常秩序」時，並不關心民主授權和法治程序，使用起鐵腕來毫不留情（魏京生：〈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載刑天、一葉編：《兩次天安門事件》〔香港：天河出版機構，1989〕，頁126-29）。這正是「四二六社論」的基調。在完善選舉制度和實踐，以及限制民眾政治參與渠道這兩方面，鄧從來都拖延前者，抓緊後者。1980年大學生參加基層選舉的試驗成為曇花一現；1982年修憲已經刪除「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作為政治參與的合法渠道。於是我們看到，導致胡耀邦下台的1986年底的學潮，恰恰起因於上海、安徽各地大學生要求開放基層選舉而不得；而「四大」則正是1989年學生和民眾採用的主要行動方式。在這兩方面，鄧眼裏的「核心利益」，都與社會要求發生根本對立。結果，在他講話基礎上出爐的「四二六社論」，咄咄逼人地指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高調聲稱要「追究刑事責任」、「依法制裁」，一副文革期間以「階級鬥爭為綱」抓敵人的聲色俱厲嘴臉。

在民眾當中抓敵人的關鍵步驟是定性，這是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固定套路，「四二六社論」也不例外。社論說：「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動亂」的定性，成為之後一個多月裏學生和鄧小平主導之中共當局的對峙焦點。那兩個「根本否定」取自「四項基本原則」；以當時早已模糊淆亂的「社會主義制度」，為「黨的領導」同時提供理據和需求，再以黨為絕對原則，凌駕一切。不過，與毛澤東時代不同，鄧拒絕使用黨內路線鬥爭的語言。兩年前胡耀邦下台時，鄧也是主要批判被開除出黨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避免在黨內劃線鬥爭。延續他本人在「四五運動」時的務實導向，「四二六社論」反覆強調經濟發展，強調中國不能「亂」，要保護「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似乎其對手仍是空談意識形態的「四人幫」，民眾仍在追隨他的「務實」。事實上，1989年的社會不滿已經不能僅僅以是否務實來分辨，而是集中在「官倒」和腐敗——有權勢者輕易獲取經濟改革的好處，官方卻只會訓誡百姓，把沉重的代價推給一般民眾去承擔。改革的成果和代價究竟應該如何分配？這直接關係到政治體制的民主內核和維護社會公義的有效性。鄧小平一直試圖掩蓋其中的政治內涵。

在指責「動亂」時，「四二六社論」反覆申明，廣大學生本來只是要悼念胡耀邦，現在追悼會已經開過了，繼續鬧就是受壞人蒙騙煽動。同樣的意思，《人民日報》已經在4月24日評論員文章〈化悲痛為力量〉中表達過，宣布「耀邦同志……悼念活動已告一段落」，要求每一位公民要「以大局為重」（本報評論員：〈化悲痛為力量〉，《人民日報》，1989年4月24日，第1版）。「四二六社論」就此加強了威懾語氣。諷刺的是，學生最大的不滿，正是從兩年前胡耀邦因學運下台而來，針對的是「老人政治」、「非程序政治」。北京大學學生早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前四天的4月18日凌晨，已經擬就「七條」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而且在「新聞立法，開放報禁」、「公布中央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財產、收入」等內容之後，最後一條就是「正確評價這次自發的悼念請願活動」（喬初編：《戒嚴令發布之前：4.15-5.20動亂大事記》〔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頁4），要求

新聞界公正報導。以「四二六社論」回應學生，顯然是企圖將學生反應限定在悼胡，再把悼胡之後的學潮定性為敵對行動，達到在公眾中散布恐懼的目的，壓服仍在持續醞釀的抗爭。

三 「四二七」大遊行：民權意識的宣示

從示威者角度來看，學生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前已經向官方提出明確的政治要求，顯示出「八九」與「四五」的重大異同。同者在於，都是起於一位中共高層領導人離世，借助悼念的情感和為死者伸張正義的感召力，來建立政治抗議的初始正當性。而異者則來自時代環境條件的變化。1976年1月初周恩來逝世，有約百萬人「十里長街送總理」；4月4日清明節前後，數十萬人再次聚集天安門。借助悼周抒發政治不滿的活動延續了幾個月；當晚官方清除上千花圈和無數小字報後，直到4月5日最後清場當天，已經有很多呼喚鄧小平、譏刺「四人幫」，甚至影射毛澤東的演說和小字報出現，但同時仍有官方便衣高聲詆譏周恩來，有意引發眾怒（《人民日報》記者：〈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載《兩次天安門事件》，頁36-44）。由於政治環境仍然不可能容忍公開發表異見，當時的政治訴求始終隱藏在悼周的大框架下，沒有完全獨立出來；參與形式上，除了以單位名義送花圈之外，聚集廣場的民眾都是匿名的個人，沒有明確的社會群體。即便如此，清場後的官方宣傳還是立即將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且直接點名鄧小平是「黑後台」。

與此相對照，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後，悼念活動從一開始就有濃烈的政治化傾向，很快就在學生主導下，從圍繞天安門廣場中心的紀念碑轉向人民大會堂乃至中南海新華門，兩三天內，已經從單純悼胡轉向請願。官方於胡耀邦追悼會前一天宣布，第二天將在廣場四周實施交通管制，學生對此的回應是連夜遊行到廣場靜坐佔領，遊行隊列兩側還有手牽手的糾察隊，分開學生和旁觀者。大學生儼然以特定社群主體的面貌出現，向官方提出各種要求和交涉，毫不隱諱這是一次有政治目標的學潮。追悼會期間未能獲得充分回應的種種不滿，當天即轉化為全面罷課的號召。追悼會剛開完，運動的自主性隨即凸顯；悼胡這把保護傘，已在可有可無之間。其後幾天，各校學生都懷抱期待之心，到處打探消息，成立組織。4月25日晚，甫成立的高自聯已在第一次代表會上決定要在27日遊行到廣場；會議中途聽到「四二六社論」的廣播，學生們也只是討論了遇到強力阻攔時的替代方案。由此可見，從悼胡到「四二七」大遊行之前，「八九」學生與「四五」抗議群體的最大不同，一個是「請願」這種特定的政治表達方式，一個是自覺尋求以組織起來的群體身份請願並持續施壓。這兩點都指向與中共並行的政治活動，顯示出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裏，政治體制逐漸鬆綁，包括當時「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走向的改革設計，以及關於中共應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討論等等，在實際效果上已經產生出相當程度的社會空間，可以容納不在中共指導下、帶有

明確政治性質的活動和言說（「黨政分開」指中共黨務應與政務區隔。有人以為這是說「黨」必須與「政治」分開，完全是誤解。「政企分開」是指政府政務應脫離企業運作。這兩個口號牽涉到如何將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體制轉型到具有較強市場因素的經濟體制的具體操作。參見陳一諮：《陳一諮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3〕，第六章）。這兩點同時顯示出，學生們對當時這種社會政治條件有相當的自覺。

「四二七」大遊行的實際進程表明，不但學生們對此有自覺，社會一般成員對此同樣有相當清楚的體認。前面引文裏，亦曾提到這種與中共並行的公眾輿論和公共空間，但同時把民眾積極參與「四二七」大遊行看作是「表達自己堅決反對回歸到文革後期『四人幫』式自上而下操弄輿論的『運動群眾』」。應該說，這個解讀並不準確，至少是不全面，因為它不足以回答當日參與遊行表現出的高昂精神狀態。前文又曾將「四二七」參與人數及其組成和絕食開始後的「五一七」大遊行做比較。其實，這兩次遊行最強烈的對照，不在參與人數的差異，而是具體表現。從學生來講，雖然有4月26日一整天時間準備，但由於高自聯臨時取消遊行的決定，使得遊行成為在嚴格意義上缺乏組織的行動，而實際結果卻表現出史無前例的高度組織紀律性。在市民方面，不像5月中旬絕食已經開始，可以直接加入遊行，提出自己明確的聲援口號，要求政府和學生對話；他們在「四二七」那天始終站在遊行隊伍之外。但另一方面，「四二七」學生走出校門時，前方一些必經路口已經擠滿人群，不等學生走到跟前，民眾已經把執行攔截任務的軍警推搡到路邊。換句話說，民眾沒有自己的口號和隊列，非常注意尊重學生隊形，不去打亂，但同時又極為堅決堅定地站到學生一邊，乃至站到學生前面為他們開路。這個前所未有的集體性姿態，和當天遊行隊伍中普遍出現的「擁護共產黨」、「維護憲法」等口號結合在一起，顯示民眾反響已經超出對於回歸文革的警惕和恐懼，包含着作為「人民共和國」主權載體的自覺，以行動表達作為「人民」一員、「國家」主體的立場和自豪。

「四二七」是這種政治自覺的第一次爆發。它一方面揭示出中共與國家政權並不對等的關係本質，另一方面令民眾在相互支持的參與行動中獲得自身政治意識的解放和實現。「四二七」之後，同樣的政治意識蓬勃盛開，貫穿了「八九」抗爭的始終。幾十天時間裏，人們群情激昂地要求政府盡快與學生展開平等對話、要求李鵬下台、要求「人民軍隊」不能鎮壓人民，要求人大常委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同時，又始終堅持自己參加的是「愛國」運動。這兩方面，都是基於對自身與「國家」之間主權主體並存關係的體認。成為自己國家政治生活堂堂正正的公民參與者，是1989年以天安門為中心的抗爭運動代表的核心價值，永遠值得中國人民為之驕傲，為之紀念，為之不懈追求。

王超華 獨立學者，曾於1989年擔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國文化研究博士。